



逃犯条例 深度

拆局

專訪陳方安生：我們與中央似乎沒有一個好好的溝通渠道

“事实上香港不是一个难题，只要中央放手给我们好好管治”

端传媒记者 陈倩儿 发自香港 | 2019-11-20



陈方安生22岁加入政府，在官僚体系中打滚38年，退休后做过立法会议员，组过智库，倡议普选，也被认为和英美政府有紧密联系。对于如何拿捏政治中的时机，陈方安生并不陌生。摄：林振东/端传媒

编者按：香港困局，你我都不是局外人。反修例运动蔓延近半年，单一的修例议题，触发史无前例的管治危机，一国两制这场制度实验，面临九七以来最大的挑战。困局中埋藏了哪些新老问题，博弈中的各方在想什么，如何研判进退，局面将走向何方？“拆局”将带来系列专访，邀请政界中人、学者、时评人，与我们一起拆解局势，理顺脉络，探寻出路。

陈方安生自言是乐观派，但对于香港困局，她感觉曙光难现。

6月的时候，她还颇有信心。香港当时刚目睹一百万人和两百万人和平上街，占领金钟干道、包围立法会的行动其时已显激进，多番拖延之后，特首林郑月娥表示“暂缓”修例，民愤高涨不平。22日，在一封致林郑月娥的[公开信](#)中，陈方安生提出三点建议：

一、莫咬文嚼字，尽快宣布“撤回”修例；二、成立调查委员会，不仅厘清示威者及其家人的疑虑，也重建公众对于警察的信任；三、对612金钟冲突中可能被控暴动的示威者，还有可能被起诉过度使用武力的警察，考虑一次性特赦。

这封信以林郑月娥的朋友、前同事的身份发出，在上世纪80年代至2001年陈方安生离任政务司司长一职，两人均同为政府公仆。“以前都倾到计的（可以说话的），”陈方安生说，6月份，她曾经尝试约林郑一谈，但特首“事忙”，拒绝了。

这一年，香港有难。年轻人一批批走上街头，受伤、被捕、被控，脚步半年不停，许多老人也忍不住走出来。70岁的终审法院前首席法官李国能7月份在明报撰文，罕有批评政府“犯下严重的政治判断失误”，呼吁撤回修例，成立由法官带领的独立调查委员会；72岁的香港大学荣休教授周永新多发长文，希望政府莫以暴制暴，应主动回应市民“复和的盼望”；7月23日，陈方安生联同前公务员事务局局长王永平、政坛元老李鹏飞等，再发联署声明，强烈建议设独立调查委员会，彻查警民冲突和修例引发广泛反对的成因.....

劝勉石沉大海，有的则被明确拒绝。冲突延蔓近半年，香港的街景和人心均已大变。

10月底，在湾仔办事处接受专访这天，陈方安生依旧快语连珠，但也显得矛盾。她说自己理解年轻人的愤怒，“他们觉得今时今日到这个地步都不站出来发声，日后就没有机会”，但面对愈演愈烈的街头暴力，包括破坏港铁、破坏部分商铺、私了不同政见市民等，她表

示无法接受，也忧虑反抗者失去道德高地和部分支持；而另一边，香港警察和政府官员的表现又每天刷新她旧有的认知。

事已至此，越缠越深，仇恨和反扑看来难以停息，五个月前的建议早已显得单薄。“In politics, timing is everything。（政治决策，时机至为关键。）你采取一个行动，先后有好大分别，如果在6月的时候已经答应撤回逃犯条例，跟著就不会有示威，更不会有暴力升级。”



2019年8月2日，香港公务员在中环遮打花园发起的集会，陈方安生上台发言。摄：林振东/端传媒

那四年，中央非常非常尊重承诺

陈方安生本名方安生，祖父为国民党抗日名将，父亲为纺织品商人，母亲为国画大师，师从张大千等，1948年举家从上海来港定居，两年后父亲去世。在家人援助下，母亲独力抚养陈方安生等八名兄弟姐妹。陈方安生笑说，在方家这个大家族，面对紧张的时局，不同家庭成员也持有不同政见，面对社会严重撕裂，她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特别是参与政治，你真是要不要太执著、介怀。”

今年79岁，22岁港大文学院毕业后就加入政府，在官僚体系中打滚38年，退休后做过立法会议员，组过智库，倡议普选，也被认为和英美政府有紧密联系。对于政治繁复，陈方安生并不陌生。

她的黄金时期落在另一个香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华人从政者少，女性寥寥无几，在港英政府，她凭借标准的英式英文、亲切的露齿笑容和干练的决策手腕，仕途稳健，被称为“铁娘子”，外号“陈四万”，夺下一连串纪录——她是首三位女性政务主任之一、79年成为首位女性署长，回归前夕，93年，她成为首位华人布政司、也是唯一一名女性布政司，担当港督之下的政府二把手，统领全体公务员。

跟足程序、效忠政府、不偏不倚、用有效的方式为政府推行政策，是公务员菁英的准则。面对97回归，陈方安生直言，当时从社会各阶层到公务员团队都有疑虑，而作为公务员之首，她说自己既要负责稳定公务员军心，也要进行海外游说，“推销《联合声明》，推销《基本法》”。

在陈方安生看来，22年前的主权移交意味著香港的“宗主国”从实行议会民主制的英国，转换成“一党专政、共产主义的中国”，对于后者，特别在六四事件之后，不少香港人心有疑虑。

“但那时英国并没有咨询香港人问‘喂你们想不想回归呀？’，根本是《中英联合声明》谈好了之后就对香港人说：‘就是这样了。’好多人都有怀疑，否则怎么有这么多的人申请去加拿大、美国、澳大利亚？起码拿著外国护照有个保险。”

对于香港前途，国际上同样充满不确定。“我记得回归前后数年，北京都鼓励我们出外游说国际接受中英联合声明，去美国、加拿大，与他们国会，政府内部的人、与他们的商家会面，说服他们不需要担心，”陈方安生说，去外国游说时，她会这样介绍：“因为《中英联合声明》及《基本法》，已经稳定了香港，回归后换了一面旗及宗主国，其他方面绝对是没有改变的。香港仍旧是一个开放、自由的市场，市民可以享有一切的人权及基本自由，就算是普选，都是北京答应香港人，写了在《基本法》上面的。”



1993年9月21日，陈方安生获时任港督彭定康委任，接替霍德爵士为布政司，成为了香港开埠以来首位华人布政司，也是唯一一位女性布政司。摄：David Wong/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

现在回头看，许多港人明白，回归意味的，不仅仅是“换一面旗”。近年，中央发布对港白皮书，强调中央对港“全面管治权”，外交部发声明指《中英联合声明》是历史文件、“不具有现实意义及约束力”，人大多次对《基本法》释法，中联办在香港选举中扮演愈发关键的角色，动则召集建制派，各级中央官员越来越多地对香港事务发表指导意见，陈方安生说，香港人这半年来爆发的愤怒，是有一个“历史的积累进程”。

“根据基本法，中联办是没有任何的角色，为何近几年越来越粗暴干预香港内部管治？以往还会掩饰一下，但近几年连掩饰都完全不掩饰一下，现时为何建制派听中联办听得多过我们的特区政府？这是怎么样的一国两制？”她反问。

陈方安生强调，回归后的四年里，中央在香港本地事务上河水不犯井水。最初，中央在港的联络机构是新华社香港分社，“你从来没有听过姜恩柱（编按：时任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会出来指指点点”，2000年转变为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简称中联办。“我做四年政务司司长的时候绝对没有（受干涉），甚至，我们与中联办是没有任何的来往及关系。”

“那四年，中央是非常非常尊重它的承诺，在言行方面，从来没有干预香港的一国两制、高度自治。”

不过，港督换成了特首，“港人治港”并非那么简单。97之后，首任特首董建华酝酿推行“主要官员问责制”，试图将原为公务员体系的司局长变成特首的政治任命官员。早前接受端传媒访问时，负责构思和推行这一政策的前公务员事务局局长王永平表示，当时政策目标一是“让主要官员向市民负责”，二是给予特首“更大的空间”、“选择协助他施政的司局长”；而在政治任命官员之下，是坚守“政治中立”的公务员。

陈方安生不认同这一改革。她最终选择在2001年提前退休，彻底离开工作30多年的热厨房。外界也有声音将她的离任解读为她和董建华的不咬弦。不过，她称，当时自己担忧的是，增加并非由普选产生的特首的政治任命权，将极可能导致政府任人唯亲、唯忠诚，打破原本公务员体系任人为才、为能的系统。

“（如果我）不退下来我就没有选择，一定要为董先生出去推销这一套所谓高官问责制，还要对人说有多好、有多能提高效率、有多能提高高官的问责，全都是假的，我为何要这样做呢？我不需要为五斗米而折腰。”陈方安生语速飞快，“作为公务员做了30多年，希望离职的时候能够leave on a high note（急流勇退），而不是被迫退下来，既然我不能为你推销，我就走。”

不如相信一下香港人的智慧？

到底是陈方安生预测准确，抑或是政策执行走样已经不太重要。高官问责制实行至今17年，多被指责货不对办。

反修例运动爆发近半年，政府承认推行政策失败，特首及主要官员的民望评分大幅下跌，但至今没有任何官员问责下台，而另一边，公务员队伍，特别是香港警队，则越来越持有政治角色，有警察工会公开谴责政务司司长、有警察在微博上批评特首、透过微博和不同传媒发表个人政见。





1999年3月23日，董建华与陈方安生在政府一个记者会上。摄：Garrige Ho/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

在她看来，政府管治如今变得不跟程序，无规无矩。

“现在似乎做事没板没眼，完全是不理会既定的程序，例如警队为何可以公开责骂政务司司长，甚至连那个光头警察还要骂我们的行政长官？这些是完全违反内部的规矩。”陈方安生说，“根据他们自己的规矩，任何一个警务人员，是不能直接接触政务司司长，是要透过警务处处长，才可以逐步逐步递上去，你居然可以四个警察协会自己去见张建宗，你还要出来如此骂人，政治触觉在哪？”

陈方安生表示，她认为香港管治问题的解药，在于落实《基本法》中承诺的双普选，让香港人尝试选出自己的行政长官。根据《基本法》第四十五和第六十八条，香港在回归后依据“实际情况”和“循序渐进”的原则，实现行政长官和立法会全体议员的普选。

何为循序渐进？北京和香港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共识。92、93、94年，民建联、民主党和自由党等不同光谱的三大党先后创立，当时他们均争取在回归后十年，即2007年、2008年先后实现特首和立法会的普选。2003年港府推23条立法，触发五十万人大游行，董建华在民愤中下台，各界开始争取落实普选时间表。不过很快，2004年第十届人大常委通过文件，表示2007年特首不会由普选产生，而立法会选举过半数议席由普选产生。

退休后，陈方安生除了在报刊撰文上批评23条等，相对淡出政坛，直到2005年12月，她参加争取香港普选大游行，2006年首次参加七一游行争取普选，引起轰动。当时盛传她有意竞逐特首，但她强调目标只是要求特首向北京争取普选时间表。2007年，她以独立身份竞逐民建联主席马力去世后留下的立法会议席，成功当选。

同样在2007年，香港成功向北京争取时间表——2017年普选特首，18年普选立法会。后来发生的已经写入历史——北京发布“831框架”，就特首的提名委员会作出具体规定，被认为是在推行有筛选的普选，触发长达79天、争取真普选的雨伞运动。

普选能否落实，今天前路渺茫。“这个龙门越搬越远，到今时今日已经是2019年，达到普选的时间似乎还越来越远了。”陈方安生说，“回归这22年来，中央钦点了4个行政长官，似乎

4个行政长官都不称职，为了不同的理由，市民好自然就会说：‘你4次都不成功，不如你相信一下香港人的智慧，让我们有权选出自己的行政长官？’”



2006年7月1日，陈方安生首次高调参加七一游行，表达支持香港实行普选诉求。摄：Dustin Shum/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

在她看来，一拖再拖谈不妥，是中央不信任香港人，而不信任来源于沟通的缺乏。

“我们与中央似乎没有一个好好的沟通的渠道，有沟通之后才能够建立信任，好多时中央是误解了香港人，例如‘光复香港 时代革命’，事实上不是鼓吹独立，只不过是要回（北京）曾承诺的那种高度自治、港人治港。”她也认为，“中央了解香港人的渠道应该宽点，不应该只听中联办的人或是地产商。”

沟通的缺乏也导致揣测。“好可惜，好多香港人时时揣摩中央喜欢甚么不喜欢甚么，甚至好多时都不是中央拍板要我们这样做，是我们急不及待地想‘或者中央不喜欢我们这样，我们就不要做了’。”

她没有明言所指的是谁，但强调商家作为既得利益者，长期没有“以真诚的态度向中央解释香港人的想法”。

今天她还是经常强调，希望北京明白，放手给香港人，他们不会选出一个天天和北京对著干的特首。很大程度上，这种呼吁更像是自说自话。

“我以往与中央、中联办某些人都有沟通，但沟通渠道自从我出来选立法会议员后，就完全断绝了。我好乐意与中央沟通，我觉得沟通是人际关系必备的，有沟通才可以建立，我随时都乐意与中央沟通.....”

她的政治能量，近年大多体现在海外，特别是英美。她相对频繁的接受英文媒体的访问。2014年7月，雨伞运动爆发前，她曾和民主党创党主席、资深大律师李柱铭一起访问英国，会见副首相克莱格，希望英国关注“一国两制被侵蚀”的情况。今年3月，她也曾和立法会议员郭荣铿、莫乃光等一起出访美国，并单独会见副总统彭斯。在国际上，她仍被视为最重要的香港前高官之一，曾经民望高企的政府二把手，相比香港其他进行海外游说的团体，她可以接触到英美更为高层的政客人物。

“最令我伤心的是竟然有香港人相信这些”

中国官媒所描绘的，是另一个陈方安生。十多年前开始参与游行、出选立法会时，她被唤做“不甘寂寞”的“民主阿婆”，后来她被称为“港英余孽”、“汉奸”，来到这次反修例运动，她被骂作“黄皮白心人”，登上“乱港/祸港四人帮”的榜单，和李柱铭、黎智英、何俊仁并列。有时，榜单上的何俊仁也会被换成香港天主教枢机陈日君。



2007年12月2日，陈方安生以175,874票胜出立法会香港岛地方选区补选。摄：Robert Ng/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via Getty Images

她是否“黄皮白心”？如何看“汉奸”一词？“我一向无论在职与否，都觉得如果外国人对你个人的意见是有兴趣或是信任的，我作为一个香港公民是有责任尽量游说、尽量释除他们对香港的疑虑，事实上无论你是建制还是泛民，都应该对外国多做这些工作。”她指出，当香港的贸易伙伴“对香港的管治、一国两制起了怀疑的时候”、“你不去解释，（怀疑）不会自然而然就消失的”。

在海外说话，她称自己的原则是“不加不减”。今年3月，她在美国会见美国副总统彭斯，“他是一个好虔诚的基督教徒，第一句就问我，宗教自由在香港怎样？我就对他说，宗教自由在香港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她指出，对于一些她认为侵蚀一国两制的事情，她无法回避。例如2018年11月，《金融时报》高级编辑马凯被港府拒发工作签证，后又游客身份入境，又被拒绝入境；马凯为香港外国记者协会副主席，而该协会曾邀请陈浩天在午餐会演讲。

美国时间11月19日，国会无异议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法案留待特朗普签署，引发中国外交部等多个部门半天内多次表达强烈谴责。对于这个法案，陈方安生的看法很简单，“（法案）是没有影响的，如果你落实一国两制，你不落实，就可能有问题”。

“落实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这十四个字，她多年来接受不同传媒访问时都反复提及。她也不断强调，许多香港人期盼的是落实普选，拥有自己的民意代表，而非分离和港独。

“事实上香港不是一个难题，只要中央放手给我们好好管治，选出行政长官，不要乱扣帽子、乱标签人。”她说。

In politics, timing is everything. 时势变换，今天在街头的年轻人，或许已经觉得陈方安生这一派的观点太老土。根据香港民意研究所10月中旬对18岁以上市民进行的关于“香港独立”的民意调查，不赞成香港独立的比例为83.1%，赞成的比例为11.5%，其他认为“不知道/难讲”；而拆分年龄来看，18-29岁的人中，赞成独立的比例则为25%，不赞成的比例为64.7%，而“不知道/难讲”的比例则为10.3%。

香港的政治气候正在急速变化。近来，陈方安生有点惊讶的发现，自己在街头会被直接责骂“汉奸”。9月份，在中环街头，有两个中年男子追骂她，其中一人拿著一块写有“卖港求荣”的牌子。不久前，她和家人在香港赛马会会所里午餐，一个老太太来对她破口大骂，马会职员尴尬地过来，急忙说“这里不谈政治”。

“最令我伤心的是竟然有香港人相信这些，我从来都未曾在街上被骂‘汉奸、走狗、搞到香港这样乱、冇啖好食’，我简直是莫名其妙。”陈方安生说起来有点生气，不过她很快又说，自己忍不住挽起袖子，什么都不做。

“我几十年来的工作生涯教识我，第一，面皮要厚，第二，要逆来顺受。”她说，“我觉得虽然香港不是我出生的地方，但香港对我的家庭是非常好，我有责任回馈，无论是游说工作，在本地推动民主，我都尽量去做。我明年都80了，有一日精神，一日都会为香港做事。”



陈方安生说，“香港对我的家庭是非常好，我有责任回馈，无论是游说工作，在本地推动民主，我都尽量去做。我明年都80了，有一日精神，一日都会为香港做事。”摄：林振东/端传媒

2001年离开政府的前夕，她出席亚洲协会午餐会致词时，开首时道：“我很庆幸能成为香港历史的一部份，同时也希望历史将会宽容待我。”

问她是否记得这番话，她答：“我有这样说过吗？我都不太记得，我不计历史及人们对我的看法，我做事本著的就是要对得住良心，过不到自己的关口，就情愿不做。”

（端传媒实习记者梁中胜、韦颖芝、刘钰怡对本文亦有重要贡献。）

逃犯条例



邀請好友加入端會員
成功訂閱同享優惠

如果你喜歡
就分享給更多人吧



热门头条

1. 逝世科大学生手机最后上线为4日凌晨1时，最后信息可能为00:46
2. 理大冲突：被围两日，逾百名学生被带领离场，校园仍有示威者未撤走
3. 防暴警强攻中文大学两个半小时后撤退；网民发起各区示威“围魏救赵”，市面狼藉
4. 若“勇武”失效，反修例运动应往何处去？
5. 中大“战事”
6. 香港十年：一位“中间派”港漂的自述
7. 谁发明了新疆再教育营？《纽约时报》获400页文件揭其政治动员过程
8. “双十一”示威记录：示威延续至午夜，全日近百人送院，两人危殆
9. 华尔街日报：中国以美国式破产缓冲经济放缓压力
10. 何韻詩：面对恐惧，站在风眼，却不被风带走

编辑推荐

1. 專訪陳方安生：我們與中央似乎沒有一個好好的溝通渠道
2. 内地眼中的香港局势：被刻意制造的“仇恨”舆论
3. 王浩岚：“彭博”若出选总统，会撬动民主党初选吗？
4. 中大事件后返台学生：“每天出门前，习惯先看台北捷运有没有停驶”
5. 《阳光普照》编剧张耀升：当世界全面呼喊正能量但把你解释成黑暗
6. 理大冲突：被围两日，逾百名学生被带领离场，校园仍有示威者未撤走
7. 资源、权力争夺战：9张图带你看硝烟中的区选
8. 郭志：去中心化运动中，“不割席”的异见与包容

9. 「生前遺言」攝製組：我們知道老與死的樣子

10. 法兰克福书展2019现场：人类世、右翼极端主义，欧洲当下两大思想关键词

延伸阅读

专访新民党前政策总裁袁弥昌：建制派将面对“毁灭式打击”

「我在特首選舉後有一個寄望，希望將建制派拉去更加中間，中間一點對他們來說沒有壞處的，又可以讓多些人喜歡你。」兩年後，袁彌昌已辭退建制派的工作，擺在他面前的，是全面管治權、林鄭專橫和建制派淪為「掣掣」機器這三座大山。

专访美中关系学者：香港是新柏林？示威者太暴力？《人权法案》能否过参议院？

南加州大学美中学院院长杜克雷（Clayton Dube）和布鲁金斯学会资深研究员卜睿哲（Richard C. Bush III）与端传媒分析《人权法案》背后的国际形势。

专访曾钰成：我希望各方面能迷途知返，或是物极必反

“中央不放心，越要强调‘全面管治权’，强调你不能触碰底线……香港人就越抗拒，‘你说不能触碰底线我就触碰一下给你看’。”作为一个“仍然相信一国两制是对香港最好安排的人”，曾钰成仍希望搭桥，尽管桥已经越发脆弱。桥两边的人，有人生疑，有人抵触，有人不屑不顾，不见得都愿意上桥。

专访前问责高官王永平：港府每一步都是史无前例的粗暴

“中央有中央的底线，你就不要碰，不要冲击它管治的权威。同样，香港市民都有底线，底线就是原有生活方式、自由、法治，即使暂时不说普选，你都起码自由法治要保持，不能冲突。”

专访刘细良：中港是命运共同体，是我们那一代最错误的信念

分离意识是被逼迫出来的，而民主制度可以消解这种分离意识。